清代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

李晟文

This text attempts to study the strategy employed by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Upon its arrival in China,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 established itself rapidly, supplanting progressively the Portugese mission and forming the basis for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at the time. The growth of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 is very intimately linked with Jesuit missionary strategy to adapt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country. This strategy was manifested principally in three domains. First, the efforts on the part of the French Jesuits to adapt their rites and customs to Chinese culture; speak Chinese, adopt Chinese names, wear indigenous costumes, and adapt to local mores, etc. Secondly, their efforts to conciliate conflicts between Occidental and Chinese cultures, and above all, between the principles of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ary doctrine. This strategy on the part of the French Jesuits was indeed very efficient. It is thanks to this arm of the Jesuits the French mission speedily created for itself a fertile terrain in China and developed rapidly.

清代是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时代，也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全面传播的时期，在这个文化大交流中，法国传教士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很久以来，由于外文材料利用方面的种种困难，国内学术界似乎从未对法国传教士进行过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有感于此，参考在国外接触到的某些外文资料写成拙文，对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一个侧面——传教策略作一尝试性探讨，希冀能对国内开展对法国传教士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关于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天主教事业在华奠基人利玛窦。1610 年 5 月，他临终前有感于在华传教事业筚路蓝缕、大量需人，于是向当时任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顾问与忏悔神父的戈登（Coton）发出呼吁。①这个呼声传到欧州，由于当时戈登忙于北美传教事务，因此没有得到响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秋天，一位今天被视为法国人的耶稣会士加入到中国的传教事业行列，即著名的金尼阁神甫（有关法国传教士的法文原名、出生年月、来华日期及在华主要活动地区等情况，详见文后“总表”）。他是弗郎德勒（Flandres）地区杜埃（Douai，在今法国北部里尔市附近）人。随后而来的其同乡有史惟

贞、金弥格神甫。因为金尼阁等人所在的弗朗德勒地区当时并非法国属地，而是1668年才并入法国，所以这几位神甫的国籍至今在西方学术界仍存在着争议。[2]从今天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法国人，但在当时他们与法国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第一位被正式列入“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名单的传教士是罗德，他于1623年到达澳门，以后法国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根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分别所著的《耶稣会士传》[3]两书的记载综合统计，从1623年罗德抵达澳门到1686年白晋等五名著名耶稣会士来华之前，共有十四名“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不包括杜埃人三名神甫）。由于这时的法国传教士隶属于葡萄牙所控制的耶稣会，因而他们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势力，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十七世末，因为在中国传教事业发展的需要，当时任耶稣会中国省区会长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再次向包括法国耶稣会士在内的欧洲传教士发出呼吁，并很快得到响应。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亲自派来五名耶稣会士，即洪若翰、张诚、白晋、李明和刘应，由于他们精通科技，传教策略比较灵活，因而取得了一些中国士大夫，乃至清朝康熙皇帝的信任，从此法国耶稣会（或传教团）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开始登上中国传教舞台。1693年，康熙帝赐其住宅，随后又赐其地修建教堂，法国耶稣会在华的“大本营”北堂由此得以建立。1700年，法国在华耶稣会与葡萄牙所控制的耶稣会正式脱离关系，[4]获得“独立存在”，[5]张诚遂成为第一位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他们为了与葡萄牙耶稣会相抗衡，迅速壮大其力量，不断成批地从国内招来传教士。1698年，白晋奉康熙之命，从法国招来十名耶稣会士，著名者有巴多明、马若瑟、雷孝思等。第二年又有五人来华，包括殷宏绪、傅圣泽等人，随之法国传教士接踵而来，不绝于途。根据费赖之、荣振华所著两书（见前）及其它中外文资料进行统计，从1687年五人传教团来华到1773年耶稣会解散，共约有八十八名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详见后附“总表”）。法国耶稣会由于在组织形式上自成体系独立存在，因而在传教策略上具有自己的特色。

（二）

法国传教士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感到一种来自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与深厚传统的古老国家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他们采取面对现实而灵活的态度，选择一种与其同行在北美印第安人中所推行的“西化”（Occidentalisation）或“法国化”（Francisation）政策[6]完全不同的策略，即尽量适应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调和中西两大文化体制的冲突，达到西方天主教在“无形”、“无争”中“中国化”及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目的。这一传教策略我们可以简称之为“中国化”的传教策略（法文为 enchinoisement）。

法国传教士的这一传教策略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礼仪习俗方面的“中国化”。语言习俗是不同民族、种族相互区别的基本特征，也是不同民族、种族彼此阻隔的樊篱，尤其在古代社会，人们往往将操异语、行异俗者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者，彼此的沟通受到严重阻碍。要想从一个民族或种族“进入”另一个民族或种族，首先必须“入乡随俗”，获得言语举止方面的类似，为之“认同”。受过良好训练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法国传教士十分明白这个道理，因而自从他们来到中国后即将“入乡随俗”的活动纳入他们的传教策略之中，企望通过言语举止等外貌的“中国化”，达到为中国人所“认同”、接受的目的。法国传教士的这一活动，一是表现在操华语上，几乎所有来华法国耶稣会士都致力于汉语学习，其中不少人如巴多明、宋君荣、冯秉正、钱德明等还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听能说能看，而且还能著书立说，与中国士大夫谈古论今。二是习华俗。为了获得中国人的“形象”，法国传教士极力在各方面仿效中国人，力图“完全摆脱法国人的习惯，而成为从头到脚华化的中国人”[⑦]。为此他们取汉名、衣华服、行华礼……。如传教士李明不仅在中国行华俗，即使回到法国仍身着华服，引起轰动。钱德明为了打入宫中，竟然象演员排练一样练习贵族礼仪[⑧]。法国传教士的这一活动取得了效果，他们言行举止的“貌似”中国人，不仅使他们缩小了与中国人的距离和隔阂，获得了当时中国人一定程度的“认同”或“认可”，而且还便利了他们“鱼目混珠”于中国人之中，走南闯北、游说四方而不惹人注目，有的传教士甚至还敢对追捕他的人大声责问：“我是欧洲人吗？！”[⑨]。

外貌的“中国化”是重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传教士本人外表的被“认可”，并不意味着他们宣扬的天主教理论也为中国人接受，要想达到其天主教义同其外表一样获得中国人的“认同”或“认可”，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中国化”改造，使之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尤其使之与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相沟通。这正是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的另一重要内容。正是受这种动机的驱使，法国传教士大多致力于中西文化之协调活动，尽力建立其西方的上帝与中国的圣人（孔孟）的联系，高唱中、西信仰相通的赞歌。在这种调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大合唱中，法国耶稣会士中的形象派者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形象派一词最早出现于1732年法国汉学家弗勒雷（Nicolas Fréret）和传教士马若瑟的通信中[⑩]，主要指法国耶稣会中那些试图通过从中国古籍中寻找所谓“原始宗教”之痕迹以证明西方天主教与中国传统信仰相吻合，从而达到减少传教阻力的传教士。白晋是形象派（Figurisme）的创始人，他指出了该派传教士的行动方针：“世界上最容易促进中国人思想和心灵皈依我们圣教的办法是向他们指出圣教与他们那些古老原则及合理的哲学相吻合”[⑪]。形象派的主要成员还有马若瑟、傅圣泽和郭中传等。形象派的出现突出反映了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的特点，因而值得我们格外注意。

法国传教士尤其形象派调和中西文化冲突的活动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他们协调中国古代历史与《圣经》纪年的矛盾。根据《圣经》[⑫]记载，上帝曾降洪水惩罚有罪的世人，除诺亚（Noe）一家独蒙圣恩而获救外，整个人类遭到毁灭，诺亚遂被称为以后人类的新始祖。拉丁文《圣经》（Vulgate）将大洪水的时间定为公元前2300年。然而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与《圣经》记载并不一致。李明抱怨道：“中国人在世界上如此古老，以至他们的起源如同这浩瀚的江河一样看不到源头……拉丁文《圣经》所标出的时间对于我们查证他们的纪年并不够长”[⑬]。怎样消除二者之间的抵牾？中国历史古老悠久、不可否认，于是一些法国耶稣会士如巴多明、宋君荣、冯秉正等绞尽脑汁，最后不得不采取使用《圣经》的另一译本《圣经·旧约》七十人译本（Version des Septante）往上延长《圣经》纪年的办法使之与古老悠久而绵延不断的中国历史相吻合[⑭]。

其次是他们尽力构建《圣经》与儒家学说联系的活动。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如与之相抵牾、相冲突，都将被视为异端而无立足之地。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强烈地感到这种庞大精神体系的威慑力量，因而深深懂得要想在一个儒教的王国里传播一种新的信仰，就必须沟通这种信仰与儒家思想的联系，也即建立反映上帝旨意的《圣经》与孔孟著作的联系。然而在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时代，这两种相距万里、地各东西的经典何以能有联系？这是一个让法国传教士万分头痛的问题，看来只有进一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上才能找到连接二者的桥梁：如果东西文化在起源上

有着某种关系，那么尔后彼此的联系就顺理成章了。正是出于这一需要，李明发现“诺亚的子孙散居亚洲，最终进入中国现在称之为山西和陕西的这一最为西部的地区”。[15]。形象派创始人白晋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大谈“中西同源”：“人类来自同一祖先，本为兄弟，出自同一造物主，秉承同一圣训，具有共同之信念”[16]。既然中西同源、信仰共同，那么诺亚子孙传下来的原始教义就肯定已蕴含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形象派传教士都极力沉迷于中国古籍的梳爬、研究之中，力图找到这种原始教义的痕迹，证明天主教理论与儒家学说吻合。白晋为此专门写有《古今敬天鉴》（又名《天学本义》），“上卷以中国经书所载之言，以证符合于天主教之道理，其宗旨在复明上古敬天之原意”，“下卷乃以经文，士俗，民俗印符相对者，以证与天主教之道理相合”[17]。马若瑟写有《中国古书中基督教教义之遗迹》，直接了当地指出“中国的宗教完全包括在经典中了。在其基本教理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古代中国人从诺亚的后裔那里获得的自然教义原则。它们指导那里的人了解和崇拜一尊上帝……”[18]。傅圣泽终日埋头于这一搜寻、“发掘”之中，他的发现令东西方大吃一惊：“第一，中国书籍的起源是神授的，也即它们来自于‘天’；第二，中国人经典中的‘道’字表示基督徒崇拜的‘上帝’；第三，‘太极’一词……通常表示与‘上帝’和‘天’等同的‘道’”[19]。总之，为了获得中国儒教社会的“认同”，法国耶稣会士极力建筑一个中西合璧的神殿，将西方的上帝和中国的圣人同置其中，彼此相容。

法国耶稣会士适应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化”传教策略的最后一个内容为“科技传教”。中国不同于当时的北美等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数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不仅产生了一大批灿烂的文化、科技成果，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阶层。这个文人阶层掌握了传统文化与科技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文化代表”与“精神贵族”，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要想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传教并获得成功，争取这批“文化贵族”和“精神领袖”的同情和皈依就成为至关重要。出于这种需要，法国传教士采取了一种与其同行在北美地区所推行的政策完全不同的策略，即以西方科技为手段，以欧洲“奇器”为诱饵，诱使中国文人投入上帝的怀抱。巴多明、白晋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他们的这一深思熟虑：“为了赢得他们的注意，则必须在他们的思想中获得信任，通过他们大多不懂并以好奇的心情钻研的自然事物的知识而博得他们的尊重，再没有比这种办法更容易使他们倾向理解我们的基督教神圣真诠了”[20]；“我们奉上帝的意旨，根据百年来的实践，体会到传教士要把天主教传入中国并使之在那里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宣传科学。今后，上帝为从中国铲除异教，还必须利用科学”[21]。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时法国派来一批又一批与派往北美地区不同的传教士——“科学家传教士”。1687 年到达的五位耶稣会士号称“法王路易十四的数学家”；随后而来的传教士或为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或与法国或欧洲科学界有密切联系，他们其中有的人如巴多明、宋君荣、钱德明等还被视为有权载入科技史册[22]。这批“科学家传教士”刚到达中国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文人、贵族乃至皇帝亮出他们手中的“西方奇器”；或广交文人学士，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西方科技的优越性；或积极参加清政府主持的科技活动（如测绘地图、制造自鸣钟等）；或竭力谋求供职内廷，充当皇帝的“老师”。然而介绍西方科技知识毕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一旦他们利用手中的“西方奇器”在中国士大夫中打开局面，一旦他们凭借这一宝器获得清政府的信任，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利用一切有利时机传播其天主教理论。法国传教士在康、乾时期地图测绘中的表现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很懂得利用他们作为钦差并由庞大卫队尾随所进行的种种旅行。凡他们所到之

处，他们访问已建立的教区，与官吏们交谈，处理土地购买和教堂建筑事宜”[23]。这种策略收到了效果，不少文人士大夫正是最初出于对他们西方奇器和科技知识的好奇、羡慕而最终跨入天主教堂，即使康熙皇帝在他们连续不断的“科技进攻”下，也一再对其天主教表示宽容。

（三）

以上是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基本情况。应该讲这种尽力适应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化”策略是比较现实的，因而它给法国耶稣会士带来了不少“战果”。首先，他们言语举止的“中国化”使他们获得了当时中国人一定程度的“认同”，从而减轻了彼此之间因人种差别产生的隔阂，便利了他们在民间各地的穿行与布道；其次他们尽力调和中西文化冲突、编织《圣经》旨意与儒家经典的纽带的努力便利了他们与儒家士大夫的沟通及被他们所接纳；最后他们以传播西方科技成果为手段的传教策略使他们获得中国文人阶层乃至皇帝的信任，从而使不少士大夫、贵族成为他们的同情者、辩护人或信徒。总之，法国传教士的这一策略从总体上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可以讲，如果没有其他欧洲传教士“反其道而行之”及由此引发的“礼仪之争”，法国传教士将会凭着这套传教策略取得更多的成果。

不过，应该指出，这种尽力适应中国情况的“中国化”策略并非法国传教士首创，它的基本原则早在欧洲天主教事业在华奠基人利玛窦那里即已确立，利玛窦正是凭借这一“宝器”屡获成效，使西方天主教在整个中国内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而法国传教士所奉行的“中国化”策略又非完全停留在利玛窦时代，他们继承了利玛窦确立的总体原则，而将之进一步推向前进，法国耶稣会中形象派的出现即是一个例证。

还应该指出，这种尽力适应中国情况的传教活动也并非法国传教士所独有，受葡萄牙“保教权”所控制的其他耶稣会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也有类似的举动。不过，受制于葡萄牙的耶稣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统一体，它由各个不同国籍的传教士组成．由于国籍不一，利益有别，因而内部矛盾重重，在传教策略上也存在差别，既有利玛窦政策的拥护者，也有反利玛窦政策的龙华民的追随者。与此相比，法国耶稣会由于国籍相同，背景比较单纯，因而在对华态度与传教政策上相对一致（当然，法国耶稣会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与分歧，如形象派传教士与非形象派传教士的分歧与争论等），所以在华形成了一支独立的传教势力。1707 年，由于罗马教皇十一世派遣使节铎罗来华，反对中国教民尊孔祭祖、视中国习俗为异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清朝政府开始实行禁教，但是对法国传教士却很宽容，从 1711 至 1773 年，仍有四十六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分散在北京、广州、澳门、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等地（见“总表”），这就说明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收到好的效果，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

清代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总表*

序号	原名	汉名	生卒年月	来华 日期	来华 地点	主要活动地区	备注
1	Nicolas TRIGAULT	金尼阁（字:四表）	1577,3,3—1628,11,14	1610（秋）	澳门	澳门、南京、江西（南昌、建昌）、广东（韶州）、杭州、开封、山西（绛州）、西安	1. 又称“金尼各” 2. 杜埃人(Douai)
2	Pierre VAN SPIERE	史惟贞（一览）	1584—1628 12,20	1611	澳门	澳门、江西（南昌）、湖广地区、南京	1. 其名又作 SPIRA 2. 杜埃人
3	Alexandre de RHODES	[罗德]	1593,3,15—1660,11,5	1623 5,29	澳门	澳门	
4	Michel TRIGAULT	金弥格（端表）	1602—1667 9,30	1630		西安、山西（绛州、太原）北京、广州	杜埃人
5	Etienne FABER	方德望（玉清）	1597,2,14—1657,5,10	1630 10	澳门	澳门、山西（绛州）、陕西（洋县、城固县、汉中、西安）、北京	其名又作 LE FEVRE
*	* * *	* *	* * *	*	* *	* * * *	* * * *
6	Jean VALAT	汪儒望（圣同）	1614?,9,16—1696.10,7	1651		澳门、浙江（杭州）、江苏（南京、徐州）、上海、山东（济南、临清）、河北（正定）、北京、广州	其名又作 VALLAT
7	Adrien GRELLON	聂仲迁（若瑞）	1618,4,29—1696,3,3	1656 6(中旬)	澳门	澳门、广东（广州、南雄）、海南岛、江西（赣州、吉安、南昌）、北京	其名又作 GRESLON
8	Edmon PONCET	[蓬塞]	1613—1667,9,28	1656 7,5	澳门	澳门	
9	Jacques MOTEL	穆迪我（惠吉）	1619,8,10*—1692,8,2	1656 7,8	澳门	澳门、江西（南昌、鄱阳湖）、北京、湖北（汉阳、武昌、德安）、广州	
10	Joseph TISSANIER	[蒂萨尼尔]	1618,7—1688,12,24	1656 7,8	澳门	澳门	又作 TEYSSANIER
11	Jean FORGET	傅沧溟（遐及）	1609—1660,10,9	1656	澳门	澳门、海南岛（琼州等）	负责海南教务
12	Nicolas MOTEL	穆尼各（全真）	1622,1,7*—1657,1	1656		澳门、江西（南昌）	

序号	原　名	汉　名	生卒年月	来　华		主要活动地区	备　注
				日期	地点		
13	Humbert AUGERY	洪度贞（复斋）	1618－1673,7,7	1656 11,5		上海、杭州、广州	
14	Jacques LE FAURE	刘迪我（圣及）	1613,3,20－1675,1,28	1656 11,5		江西（赣州、建昌、吉安）、福建（汀州）、南京、上海（崇明岛）、广州	其名又作 LE FAVRE
15	Louis GOBET	乐类思（能虑）	1609－1661 11,22	1657	澳门	澳门、福建、江西（南昌等）	其名又作 GOBBE
16	Claude MOTEL	穆格我（来真）	1618,5,27*－1671,10,17	1657	杭州	杭州、陕西（汉中、城固）武昌、重庆、云南（宝宁）、江西（赣州）、北京、广州	
17	Germain MACRET	方玛诺（允中）	1620,8,13－1676,9,4	1659（以前）		澳门、江西（赣州、南昌）、武昌、福建（福州等）	
18	Jean de FONTANEY	洪若翰（时登）	1643,2,17－1710,1,16	1687 7,23	宁波	北京、南京、上海、广州	1. 其名又作 FONTENY 2. 有称"洪若时、登" 3. 任1687年五人来华传教团负责人
19	Joachim BOUVET	白晋（明远）	1656,7,18－1730,6,28	1687 7,23	宁波	北京	1. 又称"白进" 2. 形象派创始人
20	Louis Daniel LE OCMMTE	李明（复初）	1655,10,10－1728,4,19	1687 7,23	宁波	北京、山西（绛州）陕西	其名又作 LECOMTE
21	Jean－Francois GERBILLON	张诚（实斋）	1654,6,11－1707,3,25	1687 7,23	宁波	北京（其它所到之地：东北地区等）	1700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22	Mgr Claude de VISDE-LOU	刘应（声闻）	1656,8,12－1737,11,11	1687 7,23	宁波	北京、山西（绛州）、南京、福建（福州）、广州	
23	Jean－Joseph－Simom BAYARD	樊西元（若瑟）	1662,2,12－1725,3,12	1694 7,18	澳门	澳门，广东、湖南、（晃州、湘潭、长沙）、武昌、桂林	
24	Gabriel－Ignace BABORIER	卜嘉（纳爵）	1663,9,4－1727,6,14	1698 11,4	广州	陕西（汉中）、福建（汀州、上杭县、永定）、广州	
25	Jean Charles de BROIS-SIA	利圣学（述古）	1660,8,10－1704,9,18	1698 11,4	广州	江西（抚州、绕州、九江）、浙江（宁波）、广州	又称"习圣学"
26	Charles DOLZE	翟敬臣（慎中）	1663,3,25－1701,7,24	1698 11,4	广州	广州、北京以北少数民族（"Tartare 鞑靼"）地区	又称"慎则"
27	Charles DOMENGE	孟正气（若瑟）	1666,4,8－1735,12,9	1698 11,4	广州	西安、江西（抚州、绕州、九江）、湖北（黄州、汉阳）、北京、河南（南阳、开封）、广州、澳门	

序号	原 名	汉 名	生卒年月	来华		主要活动地区	备 注
				日 期	地 点		
28	Philibert GENEIX	颜理伯（务本）	1667,10,18—1699,9,30	1698 11,4	广州	广州、江苏（淮安）、浙江（杭州）	
29	Dominique PARRENIN	巴多明（克安）	1665,9,1—1741,9,29	1698 11,4	广州	广州、北京（其它：辽宁、沈阳、旅顺；山东登州）	1. 又作 PARENNIN 2. 参加康熙年间地图绘测活动
30	Louis de PERNON	南光国（用宾）	1664,7,21—1702.11,4	1698 11,4	广州	广州、北京	
31	Joseph Henry—Marie de PRE MARE	马若瑟	1666,7,17—1736,9,7	1698 11,4	广州	澳门、广东（上川岛、广州）、江西（饶州、建昌、南昌、九江、南丰）	形象派重要代表
32	Jean—Baptiste REGIS	雷孝思（永维）	1663,1,29—1738,11,24	1698 11,4	广州	广州、北京（其它：长城一带、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台湾、青海）	参加地图绘测活动
33	Charles de BELLEVILLE	卫嘉禄	1657,1,5—1730,9,29	1698 11,4	广州	广州、北京	
34	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殷宏绪（继宗）	1664,2,25—1741,7,2	1699 7,24	厦门	厦门、江西（南昌、饶州、景德镇、九江）、北京	1. 其名又作 d'ENTRECOLLES 2. 1707 — 1719 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35	Jean—Francois FOUQUET	傅圣泽（方济）	1665,3,12—1741,3,14	1699 7,24	厦门	福建（厦门）、江西（南昌、抚州）、北京	1. 其名又作 FOUQUET 2. 又称"傅苏万" 3. 形象派成员
36	Bernard RODES	罗德先（慎斋）	1646,7,15—1715,11,10	1699 7,24	厦门	厦门、北京及以北少数民族地区（"鞑靼"）	其名又作 RHODES
37	Pierre FRAPPERIE	樊继训（述善）	1664,3,9—1703,11,20	1699 7,24	厦门	厦门、北京	其名又作 FRAPIER
38	Jean—Francois PELISSON	傅圣铎	1657,9,19—1713,8,3	1699 7,25	厦门	厦门、广州	
39	Antoine de BEAUVOL-LIER	薄贤士（安当）	1657,7,2—1708,1,20	1699 11	广州	福建（福州等）、北京、广州	
40	Jean—Alexis de GOLLET	郭中传（怀义）	1664,5,4—1741,1,5	1700 8,23	厦门	厦门、江西、浙江（宁波杭州）、广州、澳门	形象派成员
41	Jean—Baptiste CHAMBEUL DE CHAM-PEVILLE	蒋若翰	1661,10,9—1732,3,18	1700 8,23	厦门	福建（厦门、福州）、广州	其名又作 CHAMBEüIL DE CHAMPEVILLE

序号	原 名	汉 名	生卒年月	来 华		主要活动地区	备 注
				日 期	地 点		
42	Cyr CONTANCIN	龚当信（东平）	1670,5,25—1732,11,21	1701	广州湾	北京、河北（宣化）、江西、上海（崇明岛等）、广州	1. 又作 CONTENCIN 2. 又称"公旦生" 3. 1716—1718年任北京本堂神甫（负责北京教堂事务）
43	Pierre Vincent DE TARTRE	汤尚贤（宾斋）	1669,1,22—1724,2,25	1701 8,7	广东上川岛	广州、山西（太原）、江西、北京	1. 又作 DU TARTRE 2. 1718年任北京本堂神甫
44	Emeric de CHAV-AGNAC	沙守信	1670,3,1—1717,9,14	1701 9,9	广州	广州、江西（抚州、绕州）	
45	Etienne—Joseph LE COU-TEULX	顾铎泽（若瑟）	1667,7,31—1731,8,8	1701 9,9	广州	广州、贵州（贵阳）、湖北（汉阳、襄阳、安陆）、湖南（衡州）	
46	Pierre de GOVILLE	戈维里（伯都）	1668,9,20—1758,1,23	1701 9,9		江西、广州、北京	其名又作 DEGOVILLE
47	Julien—Placide HERVIEU	赫苍壁（儒良、子栱）	1671.1,14—1746,8,26	1701 9,9	广州一带河上	南京、湖北（黄州）、江西（九江）、广州、澳门	1. 又作 HERVIEUX 2. 又称"赫苍碧" 3. 1719—1731年、1732—1745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48	Pierre JARTOUX	杜德美（嘉平）	1669,8,2—1720,11,30	1701 9,9		北京（其它：长城一带、东北等地）	参加地图大绘测
49	Louis PORQUET	卜文气（类思）	1671,4,7—1718,7,13	1701 9,9		江苏（常州、无锡县、江阴县）、浙江（平湖县）、广州	
50	Jacques BROCARD	陆伯嘉（德音）	1664,3,21—1718,10,7	1701 9,9		北京	
51	Antoine CHOMEL	苏安当	1668,3,31—1702,5,12	1701 9,12	广州	广州、江西	
52	Guillaume MELON	隆盛（归禄）	1666,7,15—1701,6,7	1701 9(中旬)	广州	广州、江苏（无锡、太湖一带）	其名又作 MELLON
53	Jean—Francois NOELAS	聂若翰	1669,5,30—1740,7,1	1701 9,16	广州	江西、湖北、（德安、荆州、夷陵、安陆）、河南（南阳）、广州、澳门	1. 其名又作 NOELLAS 2. 又称"聂崇正"
54	Pierre LOUPIAS	芦西满	? —1736 10,6	1702 (?)		澳门	
55	Joseph Marie de MAILLA	冯秉正（端友）	1669,12,16—1748.6,28	1703 6,16	澳门	澳门、广州、北京（其它：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台湾）	1. 其名又作 MAILLAC 2. 参加地图绘测活动

序号	原 名	汉 名	生卒年月	来华		主要活动地区	备 注
				日 期	地 点		
56	Claude JACQUEMIN	彭加德（觉世）	1663,9,3—1734,8,17	1703 7,11	澳门	澳门、上海、(崇明岛)、江苏、广州	
57	Jean TESTARD	庞克修（若汗、若翰）	1663,6,24—1718	1703 7,11	澳门	澳门、江西（建昌）、江苏(无锡)、浙江(平湖)	
58	Romain HINDERER	德玛诺	1668,9,12—1744,8,26	1706		北京、浙江（杭州、嘉兴)、江苏(常熟)、上海(崇明岛)、江西、广东、云南、山西	1. 又作 HENDERER 2. 参加地图绘测活动
59	Gilbert BORDES	［布尔德］	1671—1712（约此后）	1706		北京(?)	1. 其名又作 BORDE, BOURDON
60	Alexandre CAZALEZ	邓立山	1672,9,27—1719	1711,7	澳门(?)	广州	1. 其名又作 CAZALET 2. 有称“登,董希圣”
61	Louis—Armand NYEL	夏德修（沙勿）	1670,5,17—1737,9,2	1711,7	澳门	澳门、广州、江西	其名又作 NIEL
62	Jean BABORIER	卜日生（若望）	1678,9,9（或 14)—1752,12,11	1712 7,25	广州	湖广、广东（广州、佛山、梅岭)、浙江（杭州)、江苏(苏州、常熟)	
63	Maurice DU BAUDORY	张貌理（尔仁）	1679,5—1732,8,15	1712 7,25		广州	其名又作 BAUDORI
64	Joseph LABBE	胥孟德（若瑟）	1677,8,30—1745,6,12	1712 7,25	广州	广州、湖广山区、江西、澳门	1736—1740 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65	Etienne ROUSSET	安泰（自得）	1689,8,13—1758,9,2	1719 6(或 7)		北京	其名又作 ROSSET
66	Jean—Baptiste GRAVEREAU	倪天爵	1690,6,10—1762(以后)	1719 6		北京	其名又作 GRAVEROT
67	Antoine GAUBIL	宋君荣（奇英）	1689,7,14—1759,7,24	1722 6,27	广州	广州、北京	
68	Jean—Baptiste Charles JACQUES	［雅克］	1688,12,27—1728,8,31	1722 6,27	广州	广州、湖北(汉口)、北京	
69	Valentin CHALIER	沙如玉（永衡）	1693,12,10—1747,4,12	1728 8,30		北京	1. 又作 CHALLIER 2. 有称“沙叩玉” 3. 1745—1747 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70	Alexandre de LA CHARME	孙璋（玉峰）	1695,7,18—1767,6,27	1728 8,30		北京	又称“孙璋德昭，析津居士”
71	Jean Sylvain de NEU-VIALLE	［纳维亚尔］	1696,2,1—1764,4,30	1729 8,4		湖北（汉口、谷城、木盘山一带)、澳门	1747—1752,1758—1762 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序号	原　名	汉　名	生卒年月	来华 日期	来华 地点	主要活动地区	备　注
72	Jean—Baptiste BATAILHE	[巴塔耶]	1698.9.13—1743.6	1731 8.8	广州	广州、湖北(各城山区)、河南	其名又作 BATALLIE BATAILLE
73	Gabriel BOUSSEL	赵加彼	1699.4.23—1764.5.7	1733 7.21	澳门	澳门、北京	
74	Pierre FOUREAU	吴君(多禄)	1700.11.13—1749.11.10	1733 7.21		北京	
75	Joseph—Louis DESROBERT	赵圣修(品之)	1703.6.12—1760.4.21	1737 8.5	澳门	澳门、广州、湖北(武汉市汉口及汉水一带)、北京	1. 其名又作 DESROBERT；2. 1748—1754，1760 年任北京本堂神甫
76	Louis—Joseph LE FEBURE	[勒费比尔]	1706.8.29—1783(以后)	1737 8.8	广州	广州、江西、湖北(汉口、沙市)、江苏	1. 又作 LEFEVRE LE FEBVRE 2. 1762 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77	Louis—Marie DUGAD	[达加]	1707.2.26—1786.3.25	1737 11		湖北(汉口、襄阳、安陆、沔阳)、河南(南阳)、广州、澳门	1. 又作 DUGAST，DU GAD 2. 1752—1758 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78	Jean—Denis ATTIRET	巴德尼、王致诚	1702.7.31—1768.13.8	1738 8.7		北京	
79	Gilles THE BAULT	杨自新(德彰)	1703.7—1766.1.18	1738 8.7		北京	其名又作 THEBAUD
80	Claude—Francois LOPPIN	Kiun Tseou—Ni[洛班]	1707.9.13—1742.8.21	1739 6.23	澳门	澳门、湖北(汉口，各城山区)、河南、江西	其名又作 L'OPPIN，LOPIN
81	Pierre d'INCARVILLE	汤执中(精一)	1706.8.21—1757.5.12	1740 10.10		广州、北京	其名又作 DINCARVILLE
82	Jean—Baptiste de LA ROCHE	睦若尼安	1704.2.26—1785	1740 10.10		湖北(各城山区、襄阳)	1. 又作 LAROCHE，DELAROCHES 2. 1769 年任法国在华耶稣会会长
83	Gabriel—Leonard de BROSSARD	纪文(昭明)	1703.6.10—1758.9.3	1740 10.10		北京	
84	Michel BENOIST	蒋友仁(德翊)	1715.10.8—1774.10.23	1744 7.12	澳门	澳门、北京	
85	Jean—Francois BEUTH	杨若望(?)	1704.10.26—1747.4.18	1744 7.12		湖北(沙市等地)、澳门	

序号	原 名	汉 名	生卒年月	来华		主要活动地区	备 注
				日 期	地 点		
86	Jean－Baptiste WAAG DE SAINT－ANDRE	［瓦·德·圣安德烈］	1725,9,8－1746,2,24	1744 7,12		澳门、湖北(沙市)	其名又作 WANG DE SAINT－ANDRE
87	Jean－Gaspard CHANSEAUME	［尚佐麦］	1711,9,12－1755,4,21	1746 8.30	澳门	澳门、江西	
88	Andre－Nicolas FORGEOT	［福若］	1716,2,9－1761,3,1	1746 8,30		澳门、湖北(沙市)	
89	Jean－Joseph－Marie AMIOT	钱德明(若瑟)	1718,2,8－1793,10,8－9	1750 7,27	广州	澳门、广州、北京	
90	Nicolas－Marie POY	Wang 王	1726,3,12－1769,1,8	1754,8 15－16	澳门	澳门、湖北	
91	Mathurin de LAMATHE	河弥德(都林)	1723,11,11－1786,12,3	1755 8,23	澳门	澳门、湖北(谷城山区)、河南	1778 年负责湖广教务
92	Pierre－Martial CIBOT	韩国英(伯督)	1727,8,15－1780,8,8	1759 7,25	澳门	北京	
93	Jacques－Francois－Dieudonne d'OLLIERES	方守义(雅各)	1722,12,2－1780,12,24	1759		澳门、北京一带	其名又作 DOLLIERES
94	Jean－Baptiste BRASSAUD	［布蒙］	1719,6,23－1778(以后)	1763		湖广地区	
95	Louis BAZIN	巴新(懋修)	1712,8,24－1774,3,15	1765	广州	广州、北京	其名又作 BASIN
96	Leon－Pascal BARON	［巴隆］	1738,4,6－1784,4,12	1766		广州、北京(?)、湖北、江西	
97	Pierre LADMI-RAL	［拉米拉尔］	1723.12,15－1784,12	1766		北京(?)、湖北、湖南	其名又作 LAMIRAL
98	Jean－Matthieu de VEN-TAVON	汪达洪(玛头)	1733,9,12－1787,5,27	1766	广州	广州、北京	
99	Jean－Claude BEGUIN	［贝甘］	1732,5,18－?	1767	广州	广州	

序号	原名	汉名	生卒年月	来华		主要活动地区	备注
				日期	地点		
100	Jean－Paul Louis COLLAS	金济时（保禄）	1735,9,13—1781,1,22	1767 8,5	澳门附近	北京	其名又作 COLAS
101	Francois BOURGEOIS	晁俊秀（济各）	1723,3,21—1792,7,29	1767 8,13		广州、北京	1776 年受法王路易十六之命主管整个法国在华教务
102	Pierre de LABAUME	严守志（德纯）	1733,5,4—1770,2,20	1768 9,20		北京	
103	Jean — Joseph de GRAMMONT	梁栋村	1736,3,19—1812(?)	1768 9,26		北京、广州	其名又作 GRAMONT
104	Louis Antoine de POIROT	贺清泰	1735,10,23—1813,12,13	1770 10,20		广州、北京	
105	Hubert Cousin de MERICOURT	李俊贤（席珍）	1729,11,7—1774,8,20	1773 1,12		北京	

＊说明：①本表主要根据费赖之《原 1552—1773 年中国传教区耶稣会士传记和书目提要》(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r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上海,1932—1934 年)和荣振华《1552—1800 年在华耶稣会士传略》(Repertoite des Jesuites de Chine de 1552 a 1800)(罗马—巴黎,1973 年)二书并参考其它中法文资料编成。

②凡法国传教士法文原名的另一写法在“备注”栏内以“其名又作”、“又作”等予以注明;其汉名有异者以“又称”说明。

③关于表内传教士汉文名称,凡本人所译者以“[]”号表示。

④表内传教士的生卒与到华日期为年、月、日具体时间,如“1577,3,3—1628,11,14”即 1577 年 3 月 3 日到 1628 年 11 月 14 日,“1630,10”为 1630 年 10 月(其日不详),“1793,10,8—9”表示 1793 年 10 月 8—9 日,“1778(以后)”表示 1778 年以后。

⑤关于传教士出生年月,凡以“＊”号注明者,为新生婴儿行洗礼之日期,此当与其出生年月相差不远。

---

①荣振华《利玛窦对法国传教士的呼吁》(Joseph Dehergne:L'appel de Uatteo Ricci aux Jesurtes frangais》,见塞夫勒中心《中西交流—利玛窦》(Centre Sevres:Vne rencontre de L'Occident et de la Chine, Uatteo Ricci),1983 年,第 111—116 页。另参考见乔纳森.斯彭斯《利玛窦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02—203 页。

②国外主要研究者无论是费赖之、荣振华还是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一般都将金尼阁等称为弗朗德勒人、佛拉芒人(Flamand),或直接称之为杜埃人。倒是国内学者多直接称金尼阁为法国人。

③费赖之、荣振华所著二书分别为《原 1552—1773 年中国传教区耶稣会士传纪和书目提要》、《1552—1800 年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其法文原名详见本文后面所附“总表”之说明。

④科尔迪埃《中国通史》(Henri Cordier: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第三卷,巴黎,1920 年,第 313 页。

⑤伊莎贝尔、微席叶《1702—1776年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选》(Isabelle et Jean—louis Vissiere: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par des missionnaires jesortes,1702—1776》,法国,1979年,第19页。

⑥在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同时向当时称为"新法兰西"(Nouvelle-France)的北美地区派去了一批批耶稣会士。这些传教士有的后来再派往中国传教,如聂仲迁、汤执中。法国传教士在北美推行的完全是"西化"或"法国化"政策,采取建立定居点(Sedentarisation)与修道院(seminaire)的方法推行法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力图将被他们的称为"野蛮人"(Sauvages)的印第安人改造成法国式的、"文明了"的基督教徒。

⑦勒蒂夫《从(耶稣会士书简集)看法国在华耶稣会士(Andre Retif: Les Jesurtes Fransaie en Chine d'apres les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见《传教科学新杂志》(Navelle Revue de Science missionnaire),1948年,第180页。另见《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克尔伯夫,1780年,17卷,第66页。

⑧伊莎贝尔、微席叶《文化的交叉路口:十八世纪法国驻北京传教团》(I. et J. L. Vissiere: Un carrefour Culturel, La mission fransaise de Pekin au XVIIIe sicle),见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第三届国际汉学讨论会会刊》(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 Actes du I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巴黎,1983年,第215页。

⑨《耶稣会书简集》,23卷,第204页

⑩Rule P. A.:Kung—tze or confucius. Australia, 1972年,第208页。

⑪裴化行(Henri Bernard)《中国人的智慧与基督徒的哲学》,天津,1935年,第145页。

⑫《圣经·创世记》(La Sainte Bible), 日内瓦1979年,第1—10页。

⑬李明《一位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中国现状新志,1687—1692》(Louis Lecomte: un jesuite a Pekin—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Chine,1687—1692)。巴黎,1990年,第164页。

⑭克微尔《巴多明神甫(1665—1741)的科学通信》(Y. Grover: La correspondance scientifique du pere Dominique Parennin (1665—1741)),见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第二届国际汉学讨论会会刊》(GERIC: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巴黎,1980年,第91—92页。

⑮见注⑬,第165—166页

⑯见注⑩,第434页

⑰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页。

⑱《耶稣会士书简集》,第19卷,第48页。引自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⑲魏特克《傅圣泽:一位在中国和欧洲的耶稣会辩论家》(J. W. Witek, S. J.: Jean—Fransois Foiquet, un controversister jesuik en Chine et en Europe),见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国际汉学讨论会》(CERIC: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巴黎,1976年,第125页。

⑳巴多明写于1735年9月28日的信,见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第87页。

㉑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刘耀武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页。

㉒见注⑦,第181页。

㉓黄朗《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业绩(1534—1928)》(George soulie De uorant:Lepopee des jesvites frangais en Chine (1534—1928)),巴黎,1928年,第148—149页。